

漢學家莊延齡的道家思想研究

章坦妮

[提 要] 莊延齡是十九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初英國漢學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作為一名英國駐華外交人員，莊延齡憑藉自己的職務便利和勤勉工作，從中國現實生活和古籍史書兩方面出發，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思想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廣泛研究，成為當時英國漢學界的知名人物之一。其早年的研究重心為中國方言，後期則以道家思想為重點。莊延齡對道家思想的研究，顯示出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也反映了當時漢學界對道家思想的研究與爭論，是其漢學研究中用力較深的部分。雖然莊延齡的研究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但其相關論著使普通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化有了相對客觀、生動的印象，也深刻影響了後世的漢學家，為他們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關鍵詞] 莊延齡 漢學 業餘漢學家 道家思想

[中圖分類號] B95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5) 03 - 0090 - 09

莊延齡（Edward Harper Parker）是十九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初英國漢學界的代表人物之一。身為英國駐華外交人員，他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在中國工作、遊歷，對中國有著相當程度的瞭解。19世紀後期，英美兩國的漢學迎來興盛時代，人才輩出，氣氛活躍，成就斐然，在漢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①此時，以傳教士、商人、外交人員等為主力構成的英美漢學界，湧現出一大批像莊延齡這樣的“業餘漢學家”或“僑居地漢學家”^②，可以說，莊延齡正是19世紀英國漢學界中“僑居地漢學家”的代表，也是當時絕大部分漢學家的一個縮影。

一直以來，比起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理雅各（James Legge）等一直被學界重視的英國漢學家，對莊延齡的研究相對缺乏，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所改變。莊延齡的漢學研究範圍廣泛、內容豐富，涉及語言、思想、歷史、經濟、法律等多個方面，而目前研究大多仍以莊延齡生平及其方言研究為重點，並未太多涉及他在其它領域的探索。此外，通過研究莊延齡而對19～20世紀英國漢學整體發展情況、漢學家之間的交往聯繫、漢學圈子的形成與活動等問題的研究仍然缺乏。因此，本文將重點放在莊延齡漢學研究生涯的後半期，即他對道家思想的研究，以求揭示莊延齡漢學研究的方法、理念、特點、成就，以及他在英國乃至世界漢學發展歷史上的位置，以一窺當時英國漢學界的學術氛圍與狀況，使更多學者關注以莊延齡為代表的早期漢學家、“僑居地漢學家”，以及英美漢學發展初期的情況。

一、莊延齡其人及其漢學研究

莊延齡原名 Edward Harper Parker，亦譯為派克、巴克爾等，1849 年 1 月 3 日出生於英國利物浦，幼年喪母，父親是一位被稱為“外科醫生”的“手工藝人”^③，他還有一位兄長，曾在利物浦當教師^④。莊延齡所受教育不高，幼年時曾接受天主教教育^⑤，後從事棉花、茶葉和絲綢生意。1867 年，莊延齡“師從國王學院第二任漢學教授蘇謀斯學習漢語一年”^⑥，之後為英國領事館工作^⑦，從而來到中國。為方便工作，他還跟隨過一些中國人（如漢口人、廣東人、上海人、寧波人等）學習中文，由此對中國的不同方言有了初步認識。1869 年，莊延齡到達北京，擔任英國駐華使館翻譯生，開始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生涯。莊延齡在中國多地擔任過外交職務，還曾在朝鮮、緬甸等國家工作，並到東南亞遊歷，使他對複雜多變的中國、周邊國家及它們與中國的關係有了形象、深刻的認識，從而在看待許多問題時能夠採取相對客觀的態度。在工作中，莊延齡展現過優秀的外交才能，並多次化解危機，卻因自己暴躁、刻薄的脾氣而未能在事業上取得大的成就。^⑧在華期間，莊延齡與許多清朝官員有過接觸，也經歷過不少重要事件，如甲午戰爭。^⑨

1894 年，莊延齡正式退休。離開中國後，他擔任過利物浦大學“漢文准教授（Reader）”和曼徹斯特大學漢學教授。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中，莊延齡依舊繼續著自己對中國的研究，且筆耕不輟，不斷發表有關中國時局的文章。^⑩1926 年 1 月，莊延齡病逝。

莊延齡的漢學研究生涯始於 1871 年，主要以《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為舞臺，文章數量居該雜誌作者之首，幾乎期期出現，成為其主力之一。在他零散瑣碎的研究中，中國方言、思想及民族可算是幾個研究重點。在早期，莊延齡的研究重點是中國方言，並最終因此留名於漢學史；後期則以道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思想和西北少數民族為研究重點。勤奮的治學態度，是他廣為人知的一大特點。除此之外，人們還常用“博學”、“精力旺盛”、“周全”等詞語來形容莊延齡的研究及其治學態度。

作為一名直接接觸中國的“業餘漢學家”，莊延齡的漢學研究還具有立足實際、領域廣泛兩大特點。其研究範圍包括中國的語言、宗教、歷史、文化、對外關係，甚至植物學等。他還對中國的經濟、貿易十分關注，曾根據《東華錄》的記載撰文探討中國的稅收、土地面積，為了“使盡可能多的重要資料永久保存下來，當需要對每個項目進行研究時，可供不時之需”^⑪，“這與當時漢學界的主流研究方向有很大不同，但是他對中國經濟貿易的研究拓展了漢學研究的領域，對古代中國的經濟貿易制度研究與文化傳播有重要參考價值”^⑫。與艾約瑟（Joseph Edkins）等同時期的漢學家不同，在對中國方言的研究中，莊延齡極少僅從書籍中記載的語音出發進行研究，而是廣泛運用他在生活中接觸到的活的語言，並在繼承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研究方法的基礎上，以一套拼音系統對中國方言進行標注，並著意關注語音上的比較以及各種方言之間的關係。^⑬

在研究中，莊延齡和許多其他漢學家一樣，存在矛盾之處。在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研究時，莊延齡對風靡一時的所謂“中國文化西來說”、“巴比倫理論”並不認同，但也有揣測臆斷之處。英國駐華外交人員和漢學家的雙重身份，使莊延齡對中國懷有複雜的感情。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既帶有典型的西方色彩，也有“同情與理解”的一面。在他筆下，中國並非僵硬的鐵板一塊，各地之間、人與人之間都千差萬別。^⑭這種觀點直到今天也頗具價值。儘管在莊延齡的筆下也出現過妖魔般的中國人形象，他還是認為中國人與西方人並無太多不同，且彼此間都有偏見。沒有

基督教傳教士背景、對宗教也不熱衷的莊延齡，不像一些身為傳教士的漢學家，試圖從中國文化中尋找上帝的痕跡，他甚至認為傳教士不應過分干涉中國的民間宗教活動和儀式，中國教徒向傳教士抱怨本土儀式也許僅僅是不想出錢。^⑯這裡體現出的不僅是莊延齡對在華傳教的自由態度，還有他對世事的敏銳觀察，以及對中國文化的深刻體察。

身為一名“業餘漢學家”，莊延齡漢學研究的最大局限是當時的學術環境和時代。和 19 世紀英美漢學發展初期學界的大部分成員一樣，莊延齡更多的研究是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以及介紹和複述中國典籍，因此儘管他一生著述頗豐，對中國歷史和文化也時有獨特解讀，但成就還是不如以法國漢學家為代表的“專業人士”。一方面，他廣泛的研究大大拓寬了英國漢學的研究領域，使西方讀者能夠大量獲取有關中國各個方面的知識；另一方面，他散漫而又淺層次的研究難以產生深刻的學術成果，這也是為什麼長久以來，他的大多數研究都受到了忽略和遺忘，只有“原創性”較強的方言研究稍稍能夠引起人們的注意。儘管如此，莊延齡的漢學研究並非沒有價值，他的著作文筆簡潔曉暢而又不乏生動，通俗易懂，受到西方讀者的廣泛接受與歡迎，在向西方介紹中國歷史、文化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西方讀者認識中國的一座橋樑；其研究生涯又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的既有 19 世紀後期英國漢學的不足，也有當時英國漢學的發展狀況、漢學家的普遍興趣和思想，更有他作為英國外交人員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解讀。他的研究雖不十分深刻，也沒有太多標新立異之處，但在真實、通俗、豐富等方面，其價值是毋庸置疑的。

二、莊延齡對早期道家思想的研究

長久以來，道家思想作為中國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受到西方學者的廣泛關注。19 世紀，英語世界對道家的研究熱火朝天，當時稍有名氣的漢學家幾乎都曾探討這一問題。不少人在研究之餘，還自己動筆翻譯《道德經》，大大豐富了漢學界對道家思想和道教的研究，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也隨之引發，成為漢學史上的大事。作為一名活躍的漢學家，莊延齡也極為看重道家思想，認為它對中國人，尤其是中國文人的思想有深刻影響。不管是出於個人興趣還是為英國對華事務服務，他都希望通過自己的研究，使外國人接觸和理解中國人的思想觀念，最終打入中國知識階層。

莊延齡在研究道家思想時，首先著重研究了創始人老子的生平。對老子之後的代表性道家人物，如莊子和傳說中的列子，莊延齡則並不關心。相反，對生活在老子之前的管仲，莊延齡卻格外留意。因為在他眼中，管仲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老子，而其他後來者都只是在模仿老子而已，他們的著作也不及《道德經》。^⑰莊延齡對老子和他代表的純粹道家思想顯然更為推崇，並將老子與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相提並論。^⑱莊延齡基本上沿用了《史記》中的記載來梳理老子的生平，包括與孔子的會面、出函谷關、留《道德經》、後代情況等，因為他認為，“關於老子最好的真實材料來自差不多 2000 年前的中國第一代史學家，即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不誇張地說，《史記》是唯一真實記錄老子和道家思想的史書”，“以上記載（指老子出函谷關之前的生活）已經足夠清楚了，老子更多的私人和公共生活就不再為司馬遷所知，這一事實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加強了其真實性，因為它使我們相信這位史學家的公正與謹慎。”^⑲

對於老子的思想，莊延齡抓住了清淨、無為等特點。他還注意到老子思想中十分特別的一點，那就是對學習的不屑：“在老子心中，精緻的藝術、對財產的喜愛、貪婪以及罪行，和學習、儀式、等級、暴政是等同的。”^⑳在將老子與孔子對比時，他認為“老子是名堅定、激進的斥責者……

孔子則是名緩和者，注重秩序、尊嚴和禮節。”孔子見老子的經過體現出“兩位哲學家似乎都沒有從會面中找到對彼此的多少尊敬”，他甚至認為孔子將老子比作龍是一種“嘲諷的說法”^⑯。雖然其他漢學家也將老子和孔子當作競爭對手看待，但這種直截了當的大膽觀點幾乎未見於他人的著作中。莊延齡甚至將道家學說當作“推翻偶像、推翻封建秩序的，具有斯多葛哲學和民主平等的思想”^⑰。不過，他也指出，“雖然老子討厭一切統治者，但他還沒有達到托爾斯泰（Lev Nikolaevich Tolstoy）那種公然抨擊政府的程度；他是位社會主義者，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甚至會幫助統治者，全心全意進行細微而又必須的工作。老子承認，在這個不完美的世上，有人壓迫人、有人被壓迫，有人是統治者、有人被統治。他完全反對使用暴力，來達到壓迫的目的；但如有必要，他甚至會同意對敵人使用詭計。”^⑱對於老子的思想，莊延齡還指出很重要的一點，即老子受到管仲思想的深刻影響，尤其是在講到統治者應有的“道”時，“管子極有可能啟發了老子”^⑲。莊延齡還比較了管仲軍事思想中的“道”、“德”與老子的思想。^⑳另外，根據莊延齡的研究，管仲在闡述自己思想中的“道”時，“使用的話語和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所用的幾乎一致”^㉑。

最後，莊延齡還不忘詳細解釋“子”在中國古代時期的含義，並對簡牘的材質、特徵等做了詳細說明，以期西方讀者理解保存先秦時期書籍的不易，指出“擁有一份書寫良好的經典抄本是多麼稀有和珍貴，在老子時代有許多人擁有這種抄本的情況又是多麼罕見。因此，僅僅因為孟子的書中未提道家思想，就對《道德經》的真實性提出質疑，是不應該的，另外，《孟子》也未提及《易經》。”^㉒這樣的解釋，無形中回答了翟理斯對《道德經》的質疑，同時，對西方許多非漢學界的普通讀者而言，無疑是很有幫助的，莊延齡作品的通俗易懂，由此可見一斑。

在對秦漢時期道家思想發展的研究中，莊延齡認為秦朝焚書時，“一些特定的書籍得到了特赦，即使它們沒有被歸為特殊的一類（農書等），……古老的《易經》就在其中，它是本關於萬物本源的書，是道家思想的基礎；因為秦始皇明顯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響，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很有可能的是，老子的著作原本或其中一個抄本，也在被赦免的書中。”^㉓認為秦始皇受道家影響的還有不少人，如花之安（Ernst Faber）、艾約瑟，這一觀點並非莊延齡獨有。但莊延齡的推斷即使不是絕對錯誤的，也很有問題。首先，並無證據證明《道德經》曾逃過焚書一劫；其次，與其說秦始皇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毋寧說影響他的是以道家為名的神仙方術，或是已開始道教化的老子學說，且其他漢學家筆下的 Taoism 既指道家，也指道教，莊延齡自己則往往將兩個概念嚴格分開討論。金斯密（Thomas William Kingsmill）就曾抓住這點大加抨擊，認為莊延齡“無知”^㉔。實際上，莊延齡自己也承認《道德經》是否倖存缺乏明確證據。^㉕

對於漢初盛行的黃老之學，莊延齡相信，“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紀的老子，只是給黃帝的學說安上了一個名字（道），在之前的幾個世紀，這些道德信條就已經在中國廣泛傳播開了。”^㉖但在寫下上述句子的同一本書中，莊延齡卻稱：“人們認為，黃帝生活在公元前三千年後半期，他留下了不少關於人在社會與公共生活中責任的寶貴箴言。最近在埃及和巴比倫的發現促使我們相信，中國傳統事物會像圖特摩斯和漢莫拉比一樣真實可信。在老子之前，古代奇妙的‘道’這一詞語，是否一定和黃帝有關道德的玄妙思想有關，還不能肯定。”^㉗但不管怎樣，黃帝和老子在戰國末年、秦朝初期逐漸被尊為“道家思想的神祇和先知”^㉘是確定無疑的。有人認為漢初道家思想受到佛教影響，甚至《道德經》就是佛教典籍^㉙，莊延齡指出這一觀點不太可信，因為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是公元 65 年，班固死於公元 92 年，班固的侄子班勇撰寫了《後漢書·西域傳》，且是提到佛教的第一人，“《漢書》的作者們是在對佛教有所瞭解的情況下闡釋道家學說的，因

此如果這兩種思想間有過某些早期聯繫的話，他們是會說明的。”^⑭

另外，莊延齡詳細解釋了《道德經》名字的演變，指出《道德經》是在漢初成為這部書的名稱的，“在經過翻天覆地般的時代變遷後，（老子）原書的某個抄本得到了漢朝皇室的注意，它開始被稱為‘經’（一種‘經典的’或是‘正統的’典籍），而不再僅僅是一本書；它也被分為兩部分，上半部分以‘道’開始，另一半則從‘德’（功力）開始，在通常的說法中，這本‘老子之經’，開始使用道德這一雙音節名稱，正如《易經》、《禮記》那樣。”^⑮莊延齡相信，擁有老子著作抄本的皇室中人，很可能就是篤信黃老之學的竇太后。^⑯

針對道家與道教區別的問題，莊延齡的看法與理雅各等大多數漢學家並無二致，認為道教是道家思想受到佛教、煉丹術影響，並與欺詐手段結合而墮落形成的一種江湖術士的騙術：“在秦始皇統治向秦二世過渡時期，一些煉金術士和江湖騙子就開始扭曲老子的思想，……在老子的真正著作被發現的同時，一種全新的、墮落的道教產生了，它與之前的道家道德思想幾乎毫無關係。”^⑰莊延齡還懷疑，“老子化胡”的說法，正是“墮落腐化的道教開始宣揚的。”^⑱另一方面，在莊延齡眼中，道家與道教既然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事物，就必須嚴格區別開來。因此，他雖也偶爾介紹有關道教的知識，但在研究道家思想的著作中，用在道教上的篇幅則較少，且幾乎未曾將對二者的討論混在一起。莊延齡還時刻不忘提醒普通讀者道家思想和道教的巨大差異：“不能忘記，古代（基督誕生前）高尚的道家思想與我們所知年代的胡說八道絕不可同日而語，……不過，純粹的道家學說依然存在，並支配著中國上層人的思想。……歐洲人（對道家思想）的嚴厲批評是不能被認可的，道家思想就像中國其他古老事物一樣，有其可信而連貫的歷史。”^⑲此處的“嚴厲批評”，主要指早期漢學家把道家思想與道教混為一談和部分漢學家對道家思想的質疑。

三、莊延齡對道家思想概念的闡釋

由於文化隔閡、老子學說晦澀飄渺等眾多原因，對以《道德經》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翻譯和闡釋，長期以來都是困擾西方漢學家的一大難題。西方人對“道”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千奇百怪，根據莊延齡的粗略總結，有“上帝、自然、道理、愛、正義、慈善、理性、道路（其中文本義）、道義的原理、事物永恆的適中，等等等等。”^⑳不考慮文本的翻譯問題，僅就思想方面而言，除翟理斯掀起的關於《道德經》真偽的辯論外，當時漢學家們普遍關注的問題主要有兩個：道家思想中是否包含基督教成分？道家思想是否與印度甚至西方有關？在第一個問題上，早期傳教士多認為《道德經》中包含基督教教義的觀點，耶穌會士錢德明（Joseph-Marie Amiot）還提出了“夷希微”與三位一體的關係，即將這三個字合在一起時，其讀音與“耶和華”極為相近，這就有可能是上帝之名在《道德經》中的體現。這一觀點被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Rémusat）繼承並發揚光大^㉑，一直深深影響著後來的漢學家，直到儒蓮（Stanislas Julien）指出他的錯誤。第二個問題事實上與“中國文化 / 人種西來說”有異曲同工之妙，代表人物就是深信此說法的艾約瑟，他認為“道家中的‘三位一體’也許來自於巴比倫人的神祇 Anna, Hea 和 Moulge（或是 Hinna, Nouah, Bel）。”^㉒此處的“三位一體”，就與飽受爭議的“夷希微”有關，艾約瑟相信，道家思想受到了外國影響，是一種半本土半外來的產物^㉓，“給中國帶來這些思想的人，有經陸路來自大夏，也有經海路來自巴比倫、印度、阿拉伯。不論老子從猶太人、波斯人、巴比倫人、阿拉伯人或印度人處獲得了什麼，他都進行了適當改造。”^㉔

對這兩種風靡一時的觀點，莊延齡皆不認可。他對當時學界熱議的一些理論進行了嚴厲批

評：“要說明‘文明’西方人無可救藥的糊塗，只需指出會有人認為老子其人是全然不存在的；還有人認為，老子的著作從未像他希望的那樣流傳下來，或者它只是偽造品，要不就是些用他人著作東拼西湊的東西。第三種觀點認為希伯來詞語‘耶和華’隱藏在‘i, hi, wi’三個音節，即‘夷，希，微’，……老子在某個時候偶然地將這三個詞語結合為了一種三位一體的概念：當然，這就使得有人自認發現了老子思想中一直存在的三位一體觀念。第四，有人不但積極支持前一種觀點，但同時也相信，存在老子學說中的不是三位一體，而是迦勒底人的三位神祇，Anna, Hea 和 Bel。還有相信道教根源中包含婆羅門教內容的，相信原始佛教產生於其中的，更有人相信猶太人在神殿被毀後逃到了中國（產生了道家思想）。……也許接近這一問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敘述中國史學家的記錄，忽略外人和外國的說法。”^④在這裡，莊延齡幾乎將與其觀點相悖的各派人一網打盡，包括以雷慕沙為代表的相信老子學說中有基督教思想的人；以翟理斯為首的不相信老子或《道德經》真實性的一派人；以及以湛約翰（John Chalmers）、艾約瑟為主的，信奉所謂“巴比倫理論”的人。

儘管莊延齡並不同意許多漢學家對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但身在圈中，他的一些觀點與其他人的看法或多或少會相互影響，並產生相似之處。如湛約翰認為“在老子之前，就有人談論過許多道家思想了”^⑤，理雅各認為老子思想的“墮落”與列子、莊子有關，“孟子竭盡全力保持孔子學說的水準。而在他之前的列子，以及與列子同時期的莊子，並不在意使先師的思想變得荒謬”^⑥，莊延齡也持同樣看法。另外，莊延齡並未忽視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如他從中國神父黃伯祿的《集說銓真》中瞭解到了關於道家思想是如何一步步從最初純粹的老子學說演化為墮落的道教，再變為當代的迷信的。^⑦

在中國典籍和他人觀點的雙重影響下，莊延齡形成了對道家思想中種種概念的獨特詮釋。莊延齡認為“道”這個詞對應的是英語中的“way”，即“道路”，“但貫穿其中的主要含義是‘正道’，或者簡單地說，是真理（Truth）。”^⑧“‘德’是從‘道’中發散出來的，代表著一種行為準則，這些行為是受到‘道’指導的。”但莊延齡的這種翻譯招致了一些批評，如金斯密的猛烈抨擊。不過，從莊延齡的研究成果來看，他對“道”的理解，基本上沒有大的偏差。在他最終的《道德經》譯本中，他將“道”正式譯為“Providence”，意思是“天意”，“德”譯為“Grace”，意思是“恩典、慈悲”。^⑨

在闡述“道”的含義時，為使歐洲讀者更好地理解，莊延齡甚至不厭其煩地列舉了許多西方人物，他說：“比起以撒和雅各來，亞伯拉罕更具有‘道’。摩西身上幾乎沒有‘道’，而約瑟身上的‘道’似乎分量頗足。也許在所有的聖經人物中，約伯最接近老子思想中的典範。而以利亞和以利沙都當不起‘有道之人’這一稱號。耶穌基督的品行幾乎完全符合老子的要求，而且還包含有這位中國聖賢未提到過的謙恭和親切，但他教導人們在現世自我約束，以求來生的幸福和救贖，老子是不會支持這種思想的。”莊延齡認為符合老子思想，具有“道”的人還包括佛陀、馬克·奧勒留、叛教者尤利安（比起康斯坦丁大帝來）、培根、查理五世、腓特烈大帝（比起他父親和兒子來）、利奧十三世、迪斯雷利、達爾文等等，生動而形象。有趣的是，莊延齡覺得“從某種程度上說，托爾斯泰伯爵非常具有道家的美德；但因早年生活的放縱以及在激情中的掙扎，他身上的‘道’與其說是像達爾文的那樣由上天賜予的，毋寧說是後天獲得的。”^⑩從莊延齡的這段文章可以看出，他將“道”對應為一種謙和、堅韌、自製的品質。他還用大量篇幅解釋了普通人和政治家該如何遵循“道”。

比起其他中國古代思想來，莊延齡將道家思想置於極高的位置，並認為“雖然儒家學說是正統的官方思想，真正塑造了中國士人哲思特點的卻是道家思想，或者說，是經老子解讀、闡釋過的古代自然理念”；“佛教，甚至是儒家思想，都未能像早期純粹的道家思想那樣，深遠地影響著中國讀書人的思想”^④。有趣的是，莊延齡相信“如果老子擁有丁點兒關於重力、引力、天體的球面形狀、氧氣、碳原子、電力及其他知識的話，他必定將給與我們更加智慧的玄學理論。”^⑤雖然這種想法實在牽強，但很明顯，莊延齡十分推崇老子及其思想。不過他還是承認，道家思想是一種有些脫離實際的學說。^⑥

四、關於《道德經》真偽問題的論戰

英語漢學界對道家思想高漲而持續的熱情，很快演變為一場論戰。1886年，翟理斯發表 *The Remains of Lao Tzu* 一文，宣稱《道德經》並非老子的作品，而是後人從《莊子》、《列子》、《韓非子》、《淮南子》等書中輯錄偽造的。“此言一出，即在西方漢學界引起軒然大波”^⑦，關於《道德經》真偽和老子思想的曠日持久的爭論就此在漢學界展開，並以星火燎原之勢，迅速席捲幾乎整個西方漢學界，“將大多數對早期道家有興趣的歐洲漢學家牽扯了進來，而且這場爭端一直延續到世紀之交後”^⑧。

在質疑《道德經》真實性的一派人中，爭論的發起者翟理斯無疑扮演了領頭人的角色，他的主要支持者是金斯密。反駁的一方則人多勢眾，包括花之安、湛約翰、艾約瑟、莊延齡、理雅各等人。隨著爭論的持續發酵，連一些日本、美國學者也加入進來，包括日本學者鈴木大拙（Teitaro Suzuki）、美國學者卡魯斯（Paul Carus）等。作為反對翟理斯的一派，莊延齡這一次卻表現得並不活躍，除與湛約翰、艾約瑟一起寫過一篇文章來反駁翟理斯外，莊延齡幾乎沒有再與翟理斯發生直接的論戰，也未回應金斯密對自己的抨擊。實際上，即使是在反駁的文章中，莊延齡也只是用很短的篇幅，介紹了“神器”和“穀神”二詞，並勸諭翟理斯應尊重前人的辛勞。文中“修理翟理斯先生是很容易的，就像他認為修理理雅各和湛約翰很容易一樣”^⑨一句，可算是這次爭論中，莊延齡說過的最具攻擊性的話了。後人認為，原因是“此時，莊延齡和翟理斯關係正處於緩和期”^⑩，或是莊延齡認為湛約翰和艾約瑟的反駁已經足夠有力，“能輕而易舉擊破翟理斯的歷史證據”^⑪。

但莊延齡的沉默，並不表示他沒有堅持自己的立場。從其研究來看，他顯然是不支持翟理斯的理論的。時隔多年後，莊延齡說：“翟理斯可以隨意抓住任何稻草，就是為了證明《道德經》及老子其人係偽造這一荒謬的觀點。”^⑫事實上，在莊延齡心中，翟理斯的觀點缺乏歷史證據，“既不成熟又站不住腳”^⑬。針對翟理斯搬出莊子、韓非子等人的著作來支持自己的結論，莊延齡認為《道德經》的“真偽情況，無論如何並不比列子、莊子、韓非子、荀子及其他道家人物的著作糟糕……我們沒有關於這些著作在焚書坑儒後被重新發現的準確信息，因此從邏輯上說，不能認為它們的真實性就高於老子的著作”^⑭。在之後的文章中，莊延齡這樣評價翟理斯：“毫無疑問，比起他的前輩來，翟理斯在翻譯許多單獨的句子上更為成功，但他似乎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就宣稱那些自己能夠理解的部分為‘真實’，而對自己和他人無法理解的部分，則斥之為‘偽造’。他在列舉歷史證據時表現得並不很明智，在表達觀點時也並不十分公正，更不用說他的與主題無關的人身誹謗了。”^⑮莊延齡還用翟理斯編撰字典時未提衛三畏的事對比其他古人未提老子之事，可以說乘機對翟理斯進行了一番諷刺。^⑯最後，莊延齡貌似輕鬆而又略帶嘲諷地宣稱，對翟理斯

的“異端邪說”，要“像道家思想要求的那樣，‘報怨以德’”。^⑥

實際上，莊延齡不但批評許多西方學者的研究使道家思想更加難以理解，還認為大家對道家思想研究的態度太過輕佻，在他心中，“在道家的問題上，中國學者是絕對的唯一原始權威”^⑦，“大多數具有漢學主張的歐洲學者都嘗試過在某種程度上闡釋關於‘道’的理論，但就我看來，比起原文的表述來，他們勞動的結果加起來甚至使這一特別晦澀的主題更加莫名其妙了。”^⑧在莊延齡看來，西方學者應採用更為審慎的態度來對待老子和道家思想。在談到自己對道家思想的研究時，莊延齡說過一段頗為自矜的話：“就我個人來說，能夠安然度過19世紀，並且避免沾染上惡習，真不知是好是壞；如果說經過三十五年與中國書籍為伴的日子後，我最終（在1903年）還是向這種誘惑（研究道家思想）低頭了，那麼我在犯下他人盛年所犯錯誤時，至少能因自己的老邁而獲得些許諒解。”^⑨

對於這樣一種深刻而晦澀的思想，莊延齡的確一直保持著敬畏之心。他曾明確地總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完全忽略所有外國人就這一主題所寫的文章，而開始就我所認為的真實情況進行闡述。就我看來，所有非中國的評論者，都對爭論熱情滿滿，都忘記了最重要的一點，即他們沒有告訴一般讀者中國本土的說法，而是全都熱烈地談論著他們認為的真實情況。我只是陳述迄今為止我所能從文字中讀出的事實；至於我無法解釋的部分，我很願意用孔子的話來表達——‘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⑩

事實上，對於自己定下的標準，莊延齡大致上確能達到。在研究中，他廣泛運用中國史書、古籍，針對書本記載進行介紹、闡述，對於歷史記載中未提及的部分，則並不多提；他對《道德經》的版本問題也沒有忽略。但同時，他也坦誠地說：“我只有兩個版本的《道德經》，且必須承認的是，我認為此書極為晦澀難懂。”^⑪另外，令人遺憾的是，不管莊延齡怎樣竭力以客觀的態度對待道家思想，在研究和闡釋的過程中，他個人的主觀想法多少會留下一些痕跡，有時也無法完全避免“胡亂猜測”的錯誤。但無論如何，這些錯誤推論瑕不掩瑜，莊延齡對道家思想的研究，仍有值得今人探索的價值。

餘 論

作為19世紀後期直到20世紀初英國漢學界的活躍人物，以及“業餘漢學家”、“僑居地漢學家”的代表形象之一，莊延齡在漢學研究上頗有成就，也帶有時代和身份的深刻烙印。在他後期用功最多題目——道家思想方面，他的研究嚴格立足於中國典籍，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通過勤勉的工作，用自己通俗曉暢的文字將以道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思想和《道德經》等經典介紹給西方讀者，並對漢學界的浮躁風氣提出了批評和糾正的方法，並在題材、方法、成果、缺陷幾個方面，多多少少對當時漢學的發展狀況、“業餘漢學家”的研究特點有所反映，頗有價值。另一方面，在對道家思想研究中，他呈現出的矛盾之處，又體現了自己作為“業餘漢學家”在學術上的薄弱和當時學術風氣對他的深刻影響。

總而言之，對於莊延齡的研究，我們可以用以下的話進行總結：“我們可能會強烈反對他的一些結論，但當我們從他那些數量龐大、表述準確、文字精妙的作品中獲益時，我們只能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⑫事實也的確如此，儘管曾經遭到遺忘和忽視，莊延齡及其漢學研究仍在漢學發展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並吸引了越來越多學者的目光。

作者簡介: 章坦妮，廣州市人民政府地方誌辦公室編輯。廣州 510091

[責任編輯 陳志雄]